

2009 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述评

李华瑞 杨瑞军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100089)

2009 年发表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论文近 200 篇,出版学术著作有:《漆侠全集》12 卷,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王曾瑜《涓埃编》,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高桥弘巨著、林松涛译《宋金元货币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以下均为 2009 年版);宁欣《唐宋都城社会结构研究——对城市经济与社会关注》(中华书局);张显运《宋代畜牧业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张国旺《元代榷盐与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杨印民《帝国尚饮:元代酒业与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高楠《宋代民间财产纠纷与诉讼问题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陈国灿《南宋城镇史》(人民出版社);邱云飞《中国灾害通史·宋代卷》(郑州大学出版社)。另外,范立舟、曹家齐主编《张其凡教授荣开六秩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何忠礼主编《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上下册,人民出版社),两部论文集亦收录多篇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论文。

近年来,宋代经济史虽然取得一定的进步,但是许多研究呈现出细化、琐碎的倾向,引起学界的注意。柳平生通过分析近年来宋代经济史研究的若干重要范例,认为经济史研究若欲取得更大进展,必须重视经济学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依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选用适宜的分析工具,将史实与理论有机地融为一体,是提高经济史研究水平,并与国际接轨的可行路径。^① 以下主要介绍论文。

农牧业 刘本锋认为辽代农业的发展改变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使辽统治者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拓展了农耕文明的疆域,促进了城镇的发展,加强了民族团结,推动了文化融合。^② 钱克金、张海防在认真甄别了有关史料的基础上,以叙述与统计相结合的方法,对宋代太湖地区农业水利的实际修治情况,进行了总的勾画。^③ 米玲、王彦岭认为定州农业经济具有很鲜明的军事特质。无论在土地的使用,还是在劳动力的使用以及农作物种植方面都具有军事色彩。^④ 李三谋认为西夏政府不断引进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设备,使西北边疆的种植业迅速壮大起来,尤其是所辖河套地区,基本达到了中原水平。^⑤

谭黎明认为宋元时期无论是生产工具还是积肥施肥和作物耕作栽培等方面的技术,都有长足的发展,为宋元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⑥ 王颢、王为华认为作为农作器具的“秧马”,在南宋、元之际,推广至淮东、淮西、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甚至黄河以北。其起源地很可能是在广东。^⑦ 张显运在介绍宋代牧牛业发展概况的基础上,从耕牛饲养技术的提高、耕牛疫病防治技术的发展和相牛技术的进步几方面对宋代耕牛牧养技术进行了探讨。^⑧ 马华阳通过引用大量历史文献的方式,考察了两宋时期麦、稻、粟等粮食作物种植的地理分布。指出两宋时期出现了麦粟南下和水稻北移的新景象。^⑨ 夏宇旭从耕作技术、水利兴修和农田灌溉 3 方面介绍了金代农业科学的成就。^⑩ 陈瑞认为元代安徽地区粮食作物得到广泛种植,安徽成为当时全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供应基地之一。受自然条件、历史传统、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元代安徽境内粮食作物的生产种植在地域分布和种植面积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异。^⑪

① 探求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的有机结合——由宋代经济史研究说开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9 年第 5 期。

② 《辽代农业发展刍议》,《农业考古》2009 年第 6 期。

③ 《宋代太湖地区农业水利的治理及其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 年第 1 期。

④ 《北宋定州军事特质农业发展管窥》,《河北大学学报》2009 年第 3 期。

⑤ 《西夏境内河套地区的农耕开发》,《古今农业》2009 年第 4 期。

⑥ 《论宋元时期农业科学的发展》,《安徽农业科学》2009 年第 11 期。

⑦ 《桐马禾云——宋、元、明农具秧马考》,《中国农史》2009 年第 1 期。

⑧ 《宋代耕牛牧养技术探析》,《安徽农业科学》2009 年第 4 期。

⑨ 《宋代粮食作物种植的分布》,《安徽农业科学》2009 年第 5 期。

⑩ 《金代农业科学发展探讨》,《安徽农业科学》2009 年第 3 期。

⑪ 《元代安徽地区粮食作物的生产种植及其影响因素》,《中国农史》2009 年第 3 期。

段琳认为中国传统的乡里制度至宋代完成了由乡官到职役的演变,而这一过程,恰恰反映了国家与社会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变化。^① 白宏刚考察了宋代的中央和地方林业职官制度及管理职能。^②

张显运认为北宋时期西北地区畜牧业发展迅猛,是宋政府主要的牲畜供应地。“地气高寒”的气候地理条件和庞大的社会需求是西北地区畜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③ 张显运指出宋代为增强军事力量,出台了许多有关官马管理和役使的律令措施,对官马的注籍、烙印、养饲、医治、孳育、调习、差配、驿马管理和屠杀官马的处罚等十几个方面作出了详尽的规定,为官营牧马业的发展保驾护航。^④

陈平平根据分散在宋、元、明时期的一些古籍中较可信的记载,经整理统计,元代约有牡丹品种 194 个,数目可观。并认为元代乃是中国观赏牡丹栽培史上一个客观存在、不可跳越和忽略的承前启后的历史阶段。^⑤

易彪认为岭南地区由于湿热的生态环境影响了当地男子的身体素质,男子不宜从事生产劳动;当地人利用丰富的物产条件从事贸易获利,逐步形成了宋代“惰农自安”,无所事事,以至“业农者鲜”的习俗。^⑥

土地制度与产权 邢铁指出宋代墓田主要存在于东南地区是家族组织的变化决定的。^⑦ 郭东旭认为“实封投状”虽然是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宗旨,但其展现的追求公开、公平、机会均等的法定形式和创新精神在一千年前的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⑧ 余寅同认为宋律在田宅等不动产之买卖中,赋予亲族、邻人以及其典权人等特定身份的主体享有优先购买权。优先购买权制度的设立,是法律儒家化的产物,是封建时期统治者出于对于社会管理的创设的一项制度。^⑨ 刘云、刁培俊认为南宋义役田的来源与所有权、经营权、转让权等权力束都有自身的特色,是宋代经济领域的一个新内容。它对稳定南宋时期的统治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⑩ 刘巧兴认为经界法的实施对南宋的土地产权私有制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并且对宋以后的历朝历代对私有土地的管理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⑪

包伟民、尹成波认为宋代“别籍异财法”经过真宗、仁宗、孝宗、光宗等时期的多次修改,逐渐确立了子孙的财产权。考以史实,“别籍异财法”在社会基层的实际推行效果并不理想。^⑫ 朱运荣、马庆岭探讨出嫁女在获得奁产陪嫁之外,以女儿身份对娘家在户绝、户绝有命继子和招赘入赘等情况下的财产的再次承分。^⑬ 刘志刚认为宋代担保行业与其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之间既有相适合的一面外,也有不相适合的一面,而且不相适合的一面又严重阻碍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⑭ 卢煜雯认为由宋统治者偏安一隅的偏好特征所决定的产权与制度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宋朝的内忧外患,民众免于战乱,宋朝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经济得以发展。^⑮ 彭志才指出北宋仁宗至和年间发生在潭州“分买珠子案”是一起地方官员因产生贪猥之心、违法分买害死商人珠子,却因法律对商人的合法权益加以保护而未能得逞的民事案件。这一个案,体现了宋代财产所有权、继承权等法律制度方面的时代特色。^⑯

地域经济 杨惠玲认为宋元时期藏区社会经济水平比吐蕃时期有了很大的提高,牧、农、工、商等重要的经济部门都获得了发展。^⑰ 杜林渊等认为北宋时期是陕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使得这一时期的开发具有明显的军事性和不稳定性。由于过度的垦伐,使得陕北地区自然环境恶化和土地沙漠化程度进一步加深。^⑱ 傅蓉蓉北宋前期,鄱阳湖经济圈以核心城市为支点,以传统产业发展为基础,以新产业的迅猛成长为亮点,成为王朝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在其发展的带动下,该区域的文化也取得了长足发展。该地区由此逐渐成为北

① 宋代乡村基层组织演变释疑,《西安社会科学》2009 年第 3 期。

② 宋代林业职官述略,《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 年第 12 期。

③ 试论北宋时期西北地区的畜牧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 年第 1 期。

④ 简论宋代官马管理和役使的律令措施,《温州大学学报》2009 年第 1 期。

⑤ 我国元代牡丹品种和数目的研究,《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9 年第 3 期。

⑥ 宋代岭南地区“惰农自安”、“业农者鲜”习俗成因初探,《黑龙江史志》2009 年第 5 期。

⑦ 宋代的墓田,《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 年第 5 期。

⑧ 实封投状法:宋代国有资产流转中的竞争机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 年第 3 期。

⑨ 宋朝田宅先买权制度研究,《法制与社会》2009 年第 34 期。

⑩ 南宋义役田的产权分析,《史学月刊》2009 年第 4 期。

⑪ 论南宋经界法在福建的实施,《法制与社会》2009 年第 33 期。

⑫ 宋代“别籍异财法”的演变及其原因阐释,《浙江大学学报》2009 年第 3 期。

⑬ 宋代出嫁女财产权探析,《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 年第 6 期。

⑭ 宋代动产交易与担保制度研究,《河北大学学报》2009 年第 1 期。

⑮ 新制度经济学框架下的宋代经济分析,《时代金融》2009 年第 4 期。

⑯ 经济史视角下的北宋潭州“分买珠子案”,《怀化学院学报》2009 年第 6 期。

⑰ 论宋元时期藏区经济发展的特点,《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4 期。

⑱ 北宋时期陕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丝绸之路》2009 年第 4 期。

宋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南移的关键区域。^① 吴建伟认为金朝通过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各方面对山西的经营,从而巩固了金朝的边防,促进了山西经济、文化的发展。^②

雷学华、陈晓燕认为南汉统治的时间虽短,但对岭南地区的开发仍有影响。两宋北边不靖,统治中心南移,使岭南的开发得以明显加快。^③ 麦思杰以广西左右江地区为例,探讨两宋时期该地区羁縻制度的建立、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元以后的土司制度。认为该制度形成过程与当地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以及市场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④ 张锦鹏认为交通状况约束了宋代广西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经济总体呈现落后状况。“交通达、区域兴,交通闭、区域弱”的发展规律,在宋代广西已经很典型地体现出来。^⑤

黄英认为宋代蜀商的产生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从他们的种类、活动、资本流向以及作用等方面可以看出,宋代蜀商促进了四川以及其它地区经济发展。^⑥

手工业 郭书杰从区域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状况、社会稳定程度以及价值情感等因素对手工技术的影响出发,定位了宋元时期手工技术在质与量上的突出性与特殊性。^⑦ 余明经介绍了宋元时期福建丝绸纺织业的发展状况,并论述了丝绸纺织业的生产规模、品种、质量以及海外贸易。^⑧

高劲松、任仲书认为辽代的酿酒业规模庞大,酿酒的技术水平达到很高的水平,酿出“乳酒”等极具民族特色的酒类。^⑨ 乔迅翔考证并探讨了宋代官方营造所需木料的来源方式。^⑩ 江凌、詹嘉认为宋初青白瓷窑址主要分布于南河流域,处于且耕且陶的初级阶段,其分布状况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有着密切关联。^⑪ 彭善国全面论述了现今已发掘的西夏瓷窑遗址、出土瓷器、陶瓷器类型、制烧工艺以及周边地区对西夏制瓷业的影响。^⑫ 李进兴通过对西夏文字的起源、敦煌莫高窟的西夏壁画、榆林石窟的西夏壁画和出土的西夏文物及瓷器等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寻求西夏瓷器的造型特征、渊源关系。^⑬ 程龙刚认为卓筒井是11世纪中叶四川井盐生产者发明的一种新型钻井技术。从工艺本身来看,无论是钻凿工具、井身结构,还是扇泥和汲卤技术,卓筒井的确是一项伟大的创造性科技发明。^⑭

张毅认为山东冶矿的开采在宋元时期颇具优势,尤以金、铁生产最为有名。^⑮ 陈瑞认为元代徽州路境内的手工业主要有矿冶、丝织、酒醋酿造、文房四宝制造、刻书等,其中尤以文房四宝制造、刻书等行业较为发达。官府经营和民间经营是元代徽州手工业生产经营的主要形式。^⑯

商业、贸易 郑颖慧认为宋代建构了包括刑统、编敕、编例、条法事类和市舶条法等众多法律形式在内、调整范围全面内容丰富的商业立法体系。宋代细密完备的商业立法既是当时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法律回应,同时也是其健康稳定发展的有力保障。^⑰ 郑颖慧考察了宋代商品经济获得了新发展,取得了新成就。^⑱ 易彪认为宋代政府在对农业与商品经济关系的处理上,出现了许多与历朝的不同之处,使宋朝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的繁荣时期,经济地位也有所提高。^⑲ 魏文超、韩秀桃力图从中西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中的商人阶层的差异及其不同的历史命运这一视角,

① 《论北宋前期鄱阳湖经济圈的形成及其文化影响》,《江汉论坛》2009年第9期。

② 《试论金朝对山西的经营》,《中国地方志》2009年第2期。

③ 《试论南汉宋朝时期岭南的开发》,《广西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

④ 《地域经济与羁縻制度——宋代广西左右江地区羁縻制度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

⑤ 《宋代广西的交通与区域经济》,《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⑥ 《浅析宋代蜀商》,《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

⑦ 《我国宋元手工技术水平的历史定位》,《中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⑧ 《宋元时期福建丝绸纺织业发展的研究》,《丝绸》2009年第11期。

⑨ 《辽代酿酒业及其发展》,《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9年的3期。

⑩ 《宋代建筑木料来源考》,《华中建筑》2009年第10期。

⑪ 《宋初景德镇青白瓷来源及分布研究》,《丝绸之路》2009年第24期。

⑫ 《西夏制瓷手工业述论》,《内蒙古文物考古》2009年第1期。

⑬ 《西夏瓷器造型探析》,《兰州学刊》2009年第9期。

⑭ 《宋代四川卓筒井研究》,《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⑮ 《宋元时期山东地区矿冶业研究》,《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

⑯ 《元代徽州路的手工业》,《安徽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⑰ 《宋代商业立法论略》,《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⑱ 《论宋代商品经济的新发展》,《保定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⑲ 《中国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浅析》,《生产力研究》2009年第13期。

寻求中国与近代化失之交臂的某些原因。^① 余小满认为南宋商税违法征收现象盛行,主要表现为地方官府私自设置征税机构,额外增置征税官吏,巧立名目盘剥商旅,以及将商税课额摊派给百姓承担。^② 王德朋认为金代的商业经济是中国北方地区商业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③

贾志扬探讨宋代中国在 10 至 13 世纪东亚世界中的地位。认为在此时期内东亚的国际环境集中体现为各国彼此竞争以及相互间繁荣的海运贸易。而政治上分立的东亚世界导致海外贸易成为宋代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④ 程皓、周跃雪认为研究宋代海外贸易法律制度,对于全面认识宋代经济社会状况和我国古代商贸法律体系发展历程具有重要价值。^⑤ 黄纯艳认为宋朝始终未将与交趾的贸易纳入市舶贸易体制,不开放广州对交趾的贸易,而是在边防体制管理下进行边境互市。^⑥ 康妮对宋朝与金国之间的非正常的走私贸易进行了探讨。^⑦ 杨蕤认为五代、宋辽时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展时期,在贸易路线、贸易方式、贸易主体等方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五代、宋时通过陆上丝路进入内地的丝路商品有四大类数十种。^⑧ 朱爱武认为海外贸易的发展使明州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发展成为宋代重要的地方经济区域中心,并对明州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⑨ 杨瑾试图通过对乳香贸易的研究,了解乳香贸易对于闽和宋朝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影响。^⑩ 陈爱峰、杨富学认为在北宋时期,由于受宋夏矛盾的制约,西夏与回鹘的贸易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到了南宋时期,宋夏矛盾消亡,西夏推行了多项优惠的贸易政策,加之天盛年间国力的强盛,西夏与回鹘间的商业贸易和贡使贸易显现出繁荣的趋势。^⑪ 赵天英、杨富学西夏与宋、辽、金等通贡与榷场贸易活动频繁,在西夏对外贸易的物品中,有许多是舶来品。^⑫ 蔡定益认为金代的茶叶贸易可分为茶叶榷场贸易、茶叶走私贸易和茶叶官营贸易三类。^⑬ 程皓认为元代的市舶制度在规范海外贸易的同时,其封建本质也限制和削弱了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的潜力。^⑭ 栾凡认为在元朝与高丽的朝贡关系中对经济利益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朝贡的礼仪象征性则大为降低。^⑮ 吴迪指出云南和缅甸山水相连,两地民间往来由来已久,但由于道路的险阻等因素制约,交流受到很大影响。元朝开创了中国新的大一统局面,稳定了云南及广大西南边疆地区,打通了从云南沿伊洛瓦底江南下直达安达曼海的滇缅交通,沿途设置不少驿站,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云南与缅甸的社会经济交流,滇缅经贸因此发展起来。^⑯

史继刚认为宋代随着募兵制的制度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军事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分离,军队后勤越来越离不开社会力量和市场的支持,在军需粮草筹措转输、战马养护、医疗救护等方面,后勤保障的社会化和市场化趋势日趋明显。^⑰ 范学辉认为随着宋代募兵取代义务征兵制,促进了农民经商热潮的出现。军人与货币、市场的关系相当密切,凡是驻军较多的地区,商品交换活动通常就会趋向活跃,随即形成较为繁荣的区域市场。^⑱ 方文述、喻学忠认为北宋政府利用市马贸易控制西北吐蕃,实行怀柔羁縻,以夷制夷的边疆政策。^⑲

施存龙考察契丹人政权统治期间南北大运河中断的原因,“萧太后河”的开发,南京港的终点港具体港址。^⑳ 刘

① 《论宋代社会发展与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变革——基于 11—13 世纪中西商人阶层的比较分析》,《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 年第 6 期。

② 《南宋商税违法征收现象初探》,《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9 年第 5 期。

③ 《论金代商业经济的若干特征》,《辽宁大学学报》2009 年第 3 期。

④ 《宋代与东亚的多国体系及贸易世界》,《北京大学学报》2009 年第 2 期。

⑤ 《宋代海外贸易法律制度研究》,《理论月刊》2009 年第 10 期。

⑥ 《宋朝与交趾的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 年第 2 期。

⑦ 《浅析宋朝与金国之间的非正常贸易》,《经营管理者》2009 年第 12 期。

⑧ 《五代、北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输入品辑考》,《丝绸之路》2009 年第 6 期。

⑨ 《宋代明州海外贸易发展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宁波大学学报》2009 年第 1 期。

⑩ 《于阗与北宋王朝的乳香贸易及其影响》,《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9 年第 1 期。

⑪ 《西夏与回鹘贸易关系考》,《兰州学刊》2009 年第 1 期、《敦煌研究》2009 年第 2 期。

⑫ 《从朝贡和榷场贸易看西夏物产》,《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9 年第 4 期。

⑬ 《论金代的茶叶贸易》,《农业考古》2009 年第 2 期。

⑭ 《论元代市舶制度与海外贸易》,《高等函授学报》2009 年第 4 期。

⑮ 《元代的中朝朝贡关系》,《古代文明》2009 年第 4 期。

⑯ 《略论元朝云南和缅甸的经贸交流》,《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9 年第 7 期。

⑰ 《论宋代军队后勤保障的社会化和市场化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 年第 1 期。

⑱ 《募兵与北宋商品经济的繁荣》,《东岳论丛》2009 年第 4 期。

⑲ 《北宋御边战略的演变与西北市马贸易》,《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 年第 3 期。

⑳ 《辽代南京港》,《水运科学研究》2009 年第 2 期。

朴兵认为两宋之际,中原人口的大量南迁,使宋代中原饮食文化对南方广大地区(特别是江浙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①史燕龙认为有元一代,高丽作为东藩频繁遣使朝贡,在经过的具体城、驿的选择上略有差异,但总体上是有一条比较稳定的朝贡贡道的。^②

城市、市场 李冬楠认为辽金元都城文化的共同特点:非单一统治中心的传统,宗教建筑的营建,推崇人与自然的和谐。其形成原因在于:游牧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万物有灵的宗教观和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观。^③郝红暖、吴宏岐认为辽、西夏、金三个少数民族政权都城对中原都城制度的模仿主要表现在都城的基本形制、附属建筑及整体布局等宏观方面。^④刘小成、陈国灿认为宋时期两浙城市普遍建立起较完备的市政管理体制。在环境卫生整治方面,不少城市形成了垃圾清理、沟渠整治等一系列相关制度。^⑤余小满指出宋代通过建立并完善城市消防体制、加强城市公共事务管理、建立社会救济制度的办法,促成了我国古代城市管理制度的重大创新。^⑥林玉军、韩光辉认为金代镇的定居人口的增加和镇市建筑的修建表明镇已具有了城镇的完备形态,并承担经济、行政和军事等诸多职能。^⑦王禹浪、王海波认为目前在金源地区内发现了大量的金代女真人的筑城,他们分属于京、路、府、州、县、城寨,以及猛安、谋克军镇等行政建制。^⑧王禹浪、刘冠纓认为金代古城多数是沿着江河走向的,或以金上京为中心区域有秩序地排列;并且沿着重要山川隘口之地修筑城堡和山城。^⑨

郭学信认为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破坏了由中古延续而来的城市格局,带有消费性和商品化色彩的城市娱乐活动的兴盛,都表明中国古代城市在宋代已经背离了传统的格局而进入了真正的“城市革命”时期。^⑩孙志敏、李龙阐述了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市民阶层兴起,催生了宋代商业化、平民化的城市文化。^⑪郭建认为宋代广告艺术性明显增强,文化内涵丰富,富有民族及地域特色,而且在宋代广告与文化活动结合上越来越紧密;而元代广告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性、世俗性、创造性的特点。^⑫

赵玉祝认为汴河由于是联系北方政治军事中心和南方经济中心的纽带为开封运送了大量的物资被看做是生命线。因此托起了开封的繁荣。^⑬李合群、尹家琦运用西方现代城市设计理念将北宋东京南北御街划分为北、中、南三段,对各段的界面、节点、小品及人的活动这四大景观要素分别予以分析。^⑭张建认为对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画中虹桥“桥市”及其周边的沿汴“河市”与历史典籍记述之关联性、北宋东京清明坊与张择端画作之关联性进行探讨,能够补充前人在北宋东京城市史、民俗史研究中的不足。^⑮郭丽冰、吴业国认为宋代在东京开封府管理上,体现了对城市街道、居民饮水、沟渠排水,以及城市环境和各种肉食资源的维护与管理上。^⑯黄熾婉认为南宋时期都城临安市场上主食、副食、蔬果、调味品等供应充足,交易活动非常频繁。^⑰徐吉军亦考察了南宋都城临安水果的消费和市场供应。^⑱

财政、赋役 黄亚娟认为三司使不仅具有处理三司日常事务的权力,还有经度军费、参议军政、荐举官员、编撰会计录等权力,曾在北宋财政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⑲杨帆认为宋代左藏库在内藏库分出之后,仍然作为重要的国库之

① 略论宋代中原地区与南方的饮食文化交流,《历史教学(高校版)》2009年第4期。

② 《元代高丽朝贡道考(鸭绿江——元大都)》,《语文学刊》2009年第5期。

③ 《辽金元都城文化的特点及形成原因》,《学术交流》2009年第9期。

④ 《辽、西夏、金都城建设对中原制度的模仿与创新——兼论唐、宋都城制度对少数民族都城之影响途径》,《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⑤ 《南宋时期两浙城市的市政管理》,《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⑥ 《试论宋代城市发展及其管理制度变革》,《天中学刊》2009年第6期。

⑦ 《金代镇的若干问题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2期。

⑧ 《黑龙江流域金代女真人的筑城与分布》,《满语研究》2009年第1期。

⑨ 《黑龙江地区金代古城分布述略》,《哈尔滨学院学报》2009年第10期。

⑩ 《论宋代城市发展的时代特征》,《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⑪ 《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社会意识及城市文化的影响》,《湖南冶金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⑫ 《宋元时期广告的文化特征》,《内蒙古电大学刊》2009年第5期。

⑬ 《汴河托起北宋开封的繁荣》,《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2期。

⑭ 《试析北宋东京南北御街街道景观》,《开封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⑮ 《《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市井——北宋东京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⑯ 《北宋城市公共事务管理探析——以东京开封府为中心》,《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⑰ 《南宋都城临安的食品交易市场》,《理论界》2009年第7期。

⑱ 《南宋临安的水果消费及市场供应》,《浙江学刊》2009年第4期。

⑲ 《北宋三司使职能探析》,《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一,发挥着重要作用。左藏库主要是收入不入内藏的那部分财富。^① 姜莉通过对西夏的税法规定进行一定的梳理,介绍西夏税法中涉及到的税种和税法要素,总结归纳出西夏税法的特点。^② 江玉勤考察了元代课程(杂税)征收制度的内容、执行机构、制约等各个方面,并指出元代课程制度的某些变化及倾向。^③ 杨继红认为财政危机是元代中期统治的一个突出特点。由于财政危机长期得不到解决,元代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④

余小满认为宋代的科配盛行于征榷领域,在榷盐、榷酤、榷茶、坑冶、市易等方面都有所表现。它既是征榷制度恶性发展的产物,又是宋代吏治败坏的一个反映。^⑤ 魏天安考察两宋田宅交易征收契税的发展过程,认为南宋时期,又开征“白契钱”。随着契税的不断增加,逃税问题日益严重。^⑥ 余小满认为和买原是官民之间的自愿等价交易,但由于诸种复杂因素的促使,官府在进行和买的过程中经常实施强制摊派和盘剥,使得和买在事实上演化为非法科配。^⑦ 王坤就宋代河渡的买扑问题进行探讨,以分析买扑这种经营方式的作用。^⑧ 黄子卿、李晓指出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宋朝政府对劳动力的使用逐渐从无偿征派向有偿购买转变。衙前役最终向“雇”转变,是政府和民户选择的结果。^⑨

郭志安、张春生认为宋初黄河的漕粮运输曾一度占据重要地位。此后,伴随着陕西等地经济、军事等形势的变化,加之黄河水道自然运输条件的恶劣,黄河漕粮运输逐步趋于衰落。^⑩ 何玉红认为南宋多渠道筹集军费,为川陕边防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给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⑪ 何玉红认为南宋将川陕各地采买到的粮食通过陆路和嘉陵江水路两条路线运往边防前沿,这为川陕边防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川陕战区军粮采买与转运中,出现了诸多弊端,成为当地民众的沉重负担,体现出军队物资供应对社会的负面影响。^⑫ 陈德洋认为金代和采制度对于保障国家需要、军队供给、赈济灾民和平抑粮价,起到了作用,但是有金一代,作用和弊端始终相伴。^⑬

孙继民、魏琳研究了《宋人佚简》中的“酒帐”,辨析了其文书格式、主要内容等,并指出它应属于舒州在城酒务的会计报告,而非会计帐簿。^⑭ 李三谋、李建萍考察了宋代解盐的生产、转运、销售各个方面由政府组织进行向官营生产与私营营销的并列局面的转变。^⑮ 陶德臣认为宋朝在通商法茶叶市场管理体制下,官府对茶叶市场的管理从主要依靠计划、行政手段转移到主要依靠财税手段,因而对茶园户、茶商、官府本身都发生了深刻影响。^⑯

张国旺认为元统治者整合金代盐官体系和元初转运司体系,相应建立了盐官体系,进而推广至南方产量较大的两淮、两浙及福建盐区,并成为明清盐官设置的样板。^⑰ 杨印民认为元代总体是从以榷酤为主转向以散办为主的趋势过渡,这种特征在元中后期更趋明显。元廷对于私酒和犯界酒的打击处罚,显示了政府维护酒课利益的决心和态度,彰显了“国家经费,课程为大”的理财观念。^⑱ 杨芳、潘荣华认为药品专卖制度发端于北宋,南宋绍兴以后进一步发展。大量地方文献的记载表明,南宋各路、府、州、县创立的地方官药局非常活跃,客观上改善了城乡医药供给结构。^⑲

单鹏认为土贡在宋代具有五个方面的特点:纺织品与药品比重较大;出现了“贡非本地物”的新情况;贡物种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土贡的数量大多有所限制,财政意义不大;在宋时尤其是南宋时期出现了很多“折银贡”的现象。这

① 《钱谈宋代左藏库的收支》,《商业文化(学术版)》2009年第10期。

② 《从〈天盛律令〉看西夏的税法》,《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③ 《元代课程(杂税)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

④ 《浅析元代中期财政危机的原因》,《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⑤ 《宋代的征榷与科配》,《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⑥ 《宋代的契税》,《中州学刊》2009年第3期。

⑦ 《宋代的和买与科配》,《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⑧ 《宋代河渡中的买扑经营》,《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5期。

⑨ 《宋朝衙前役演变的博弈论分析》,《济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⑩ 《北宋黄河的漕粮运营》,《保定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⑪ 《南宋川陕战区军费的消耗与筹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

⑫ 《南宋川陕战区军粮的采买与转运——兼论南宋时期嘉陵江水运》,《西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⑬ 《金代和采利弊初探》,《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⑭ 《宋代酒务会计报告文书的确认及其意义——〈宋人佚简〉舒州酒务文书考释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

⑮ 《简析宋代解盐之通商》,《盐业史研究》2009年第3期。

⑯ 《宋代通商法对茶叶市场的管理》,《广东茶业》。

⑰ 《元代统一局面下盐官制度的重构》,《河北学刊》2009年第5期。

⑱ 《从榷酤到散办:元代酒课征榷政策的调适及走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2期。

⑲ 《南宋地方文献中的官药局考述》,《中国地方志》2009年第5期。

些特点的出现,预示着宋代土贡制度的衰落,也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① 李晓珏认为科举人口对京师房屋租赁业影响甚巨。^② 李坚认为两宋时期对闽、赣二路,体现出不同的统治理念,从而影响着地方社会的发展格局。北宋时期一度活跃于闽粤赣三边的食盐走私活动,在南宋时期变得更频繁更有组织性,成为引发地方动乱的最大因素。^③

金融、货币 葛金芳、常征江认为宋代长途贩运可以使用交子、钱引、钞引、银锭等支付手段,钱荒主要表现在基层市场的细碎性贸易中。^④ 李晓认为政府购买是货币投放市场的主要渠道,故分析钱荒问题不能无视政府购买制度的影响。^⑤ 尚琤认为宋代封建政府为了应付财政困境,常会不遵守其所制定的法令政策,使纸币成为政府搜刮掠夺民间财富的工具,最终使宋代纸币通货膨胀,也导致宋王朝走向灭亡。^⑥ 王文成认为两宋时期白银的价值尺度职能,经历了100多年的孕育、积累,在南宋得到了初步发挥。^⑦

钟兴龙认为北宋铸币量在不断增加的同时也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波动,主要原因有钱监的兴废、铜产量的变化、财政需要的影响等。^⑧ 黄澄介绍了金代后期货币的发行流通的情况,反映出货币制度发展兴衰的一般规律。^⑨ 赵艳玲认为元代纸币膨胀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政府各种非生产性财政支出无节制增加,二是政府错误地采用了挪用储备金和无限发行纸币的措施。^⑩ 唐景认为元代发行的纸币,经历了中统钞、至元钞、至大银钞、至正交钞等四个阶段,并制定了较为系统的纸币管理制度。元代末期出现罕见的恶性通货膨胀,成为元政权崩溃的重要诱因。^⑪

张恒俊认为宋钱在东南亚地区的流通促进了当时南海诸国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对东南亚地区货币经济产生过重要的影响。^⑫ 赵作勇等认为北宋钱币合金成分比较稳定,成分配比比较科学。而南宋成分数据比较分散,早期铜、锡含量较高,铅含量较低,晚期铜、锡含量较低,铅含量明显增高,合金品质大大降低。^⑬

人口、社会阶级 武玉环认为辽代人口在750万左右。^⑭ 马慧丹对辽朝初期汉族人口的来源、安置与管理以及因俗而治的意义进行探讨。^⑮ 吴伟、姜茂发认为元代的户籍分类管理制度即“诸色户计”,等同于汉朝的“编户齐民”。在各种不同的户计中,以民户、军户、匠户三种户计人数最多,覆盖面最广,基本上涵盖了元代各种不同的户计分类标准。^⑯ 张宪华从方志家谱中搜寻的资料展现了宋元时期芜湖一带移民的基本状况,丰富了地方史的内容。^⑰

辛鹏龙认为辽朝韩鲁朵下的人户属于辽朝皇家的私人财产,他们承担着沉重的赋税、徭役、兵役和各种杂役。^⑱ 王善军指出辽代燕云地区张氏家族主要通过占有土地和经营土地致富,其家产经营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和传统。^⑲ 贾芳芳认为宋代地方豪强势力强大,他们违法犯禁,恃势兼并土地,干预司法甚至杀人害命,形成了武断乡曲的古代黑势力。地方官府与豪强的关系就复杂了,有勾结,有摩擦,也有镇压。^⑳ 陶德臣认为宋代茶园户身份不同,经营绩效相差很大。^㉑ 田欣认为在代际更替的过程中,宋代商人家庭成员的身份也在发生变化,其中父商子仕的现象很值

① 《述宋代土贡之特点——以“元丰贡”、“绍兴贡”为中心》,《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② 《科举考试制度下的宋代房屋租赁业》,《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③ 《宋代闽粤赣边的城防、食盐走私与地方社会》,《汕头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④ 《宋代“钱荒”成因再探》,《历史教学(高校版)》2009年第4期。

⑤ 《北宋时期的钱荒与政府购买制度》,《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

⑥ 《简议宋代纸币流通和其监管法制》,《中国市场》2009年第13期。

⑦ 《两宋“以银计价”史料考释——宋代白银价值尺度职能补论之一》,《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⑧ 《北宋铜铸币额考论》,《东北师大学报》2009年第3期。

⑨ 《金代后期货币制度研究》,《学理论》2009年第21期。

⑩ 《试析元代纸币膨胀的原因》,《沧桑》2009年第3期。

⑪ 《论元朝的纸币管理制度》,《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⑫ 《宋朝钱币在东南亚的发现及意义》,《船山学刊》2009年第3期。

⑬ 《北宋和南宋青铜钱币对比分析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9年第1期。

⑭ 《辽代人口考述》,《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6期。

⑮ 《辽朝初期对汉族人口的安置与管理政策》,《赤峰学院学报》2009年第7期。

⑯ 《我国元代户籍分类制度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⑰ 《宋元时期的芜湖移民》,《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⑱ 《辽朝韩鲁朵户试探》,《东北史地》2009年第2期。

⑲ 《由富求贵:从归化州张氏看辽金燕云豪族的发展路径》,《河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⑳ 《宋代的豪强势力及其与地方官府的关系》,《河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㉑ 《宋代茶园户的经营业务与绩效分析》,《古今农业》2009年第1期。

得关注。^①吕变庭认为宋代富民之家盛行“随嫁田”婚俗,因此“随嫁田”成为保障出嫁女在夫家获得较高经济地位的重要的物质基础。^②李智萍认为宋代女户家庭中可以存在男性成员,宋代是女户相对自由的发展时代。^③王云裳宋代漕运由低级武臣押纲,又有舟卒随船,是其重要特点。押纲武臣和舟卒等同纲船上其他人员营私舞弊,从中获利的不法行为频频发生。^④夏宇旭对金代契丹人的部族和乣组织的设立、分布、管理以及在这一组织下契丹人的生活状况做简要论述。^⑤王雷认为官吏分途之后,金代吏员集团在官吏二元政治架构下的一个亦官亦民、非官非民的特殊阶层的面貌。^⑥张咏春金元易代之际,“礼乐户”逐渐形成,封建国家职业乐工群体以社会身份的“良”、“贱”区分为重要标志,一分为二,“礼乐户”在局部范围内代替“乐户”,行使特定礼乐职能。^⑦王亚莉指出黑城出土了大量站赤文书,其中《签补站户文卷》中 F116:W 543 记载元末站户消乏逃亡现象,朝廷命令各地站官及时签补站户,严格依照事产、物力、牲畜等财产标准来签补。他们一经签发,就成了站户主体,便长年累月、世代代被束缚在驿站系统中,为站赤服务。^⑧张贤亮认为色目人的上层与蒙古贵族一样是元政权的统治阶层,不自觉的充当了历史发展的促进者;色目人的下层人民同汉族人民一样处于社会底层,他们的劳动直接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⑨

灾害、荒政、交通 邱云飞、孙良玉认为宋代的农业自然灾害程度是相当严重的,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显示出一些规律和特征,其形成原因分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 2 个方面。自然因素主要是气候环境的变迁和各种灾害之间的互动作用;人为因素主要是过度的农业生产、战争、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手工业的发展、统治阶级奢侈腐化之风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等。^⑩郭志安、李京龙认为北宋时期黄河水患的破坏下,河北境内农业的发展在劳动力、农田、资金等方面都长期受到严重影响,从而极大制约了河北区域内农业的正常发展。^⑪栾晓丽认为人口压力以及过度的牲畜放牧,导致西夏时期河西走廊地区沙漠化严重。^⑫龚光明、杨旺生认为导致元代农业自然灾害频繁的各种社会因素,主要有屯田对地表植被的大量破坏;造船、建筑等对森林的砍伐;政治腐败荒于水利建设与维修;战争及苛刻的剥削等造成农业人口的极度贫困,无力进行水利设施建设,等等。^⑬顾静等通过对泾洛河流域元代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对该时期泾洛河流域干旱灾害等级、干旱灾害事件在时间上的变化及其成因进行了研究。^⑭

傅振宇考察了宋代文人士大夫在宋代荒政变革中的重要贡献。^⑮张俊峰认为灾异说不仅当时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论,而且成为攻击王安石变法的武器,甚至成为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⑯张崑认为宋代对地震灾害采取的种种措施为灾民的灾后生活提供了保障,减少了灾害对宋朝造成的损失。^⑰陈德洋认为地震后,金朝政府采取减免赋税、徭役、减轻刑罚和伤亡赈济等赈济措施,以此来保障民生,维护统治。^⑱申万里认为元代江南民间义庄有严格的收储制度、用人制度和赈济制度,管理严格,经营方式灵活,成为元代江南地方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之一。^⑲张新宇通过对漏泽园转铭资料的分析,可以了解北宋末年居养院和安济坊的设置、名称、救助对象及运作程序等。^⑳郭志安指出北宋时期,频繁的水患极易引发大量的人员伤亡、农田毁坏,并进而造成农业生产环境的恶化,这一状况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体现得最为明显。为此,北宋政府采取多种应对措施,借助于赐钱、赐粮、减免赋税等手段,积极开展人员

① 《父商子仕:宋代商人家庭成员身份的代际更替》,《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 年第 5 期。

② 《“随嫁田”与宋代富家妇女的经济地位》,《史学月刊》2009 年第 5 期。

③ 《宋代女户的特点》,《妇女研究论丛》2009 年第 6 期。

④ 《简述宋代漕运中押纲武臣与舟卒的营私获利活动》,《宁波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

⑤ 《初探金代契丹人的部族及乣组织》,《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9 年第 3 期。

⑥ 《金代吏员集团的内部分层》,《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 年第 11 期。

⑦ 《“非贱民”身份的元代礼乐户》,《音乐研究》2009 年第 2 期。

⑧ 《黑城出土元代签补站户文书 F116:W543 考释》,《宁夏社会科学》2009 年第 3 期。

⑨ 《浅谈元代色目人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考试(教研版)》2009 年第 9 期。

⑩ 《宋代农业自然灾害史论》,《安徽农业科学》2009 年第 7 期。

⑪ 《北宋黄河水患与河北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保定学院学报》2009 年第 6 期。

⑫ 《论西夏时期河西走廊地区土地利用方式与沙漠化的关系》,《青年科学》2009 年第 2 期。

⑬ 《元代农业灾害成因论析》,《安徽农业科学》2009 年第 6 期。

⑭ 《泾洛河流域元代干旱灾害初步研究》,《地理研究》2009 年第 2 期。

⑮ 《宋代文人士大夫与荒政变革》,《黑龙江史志》2009 年第 21 期。

⑯ 《灾异说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 年第 1 期。

⑰ 《宋代地震灾害及其救治措施》,《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 年第 8 期。

⑱ 《试论金代地震与救济》,《黑龙江史志》2009 年第 4 期。

⑲ 《元代江南民间义庄考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9 年第 2 期。

⑳ 《漏泽园转铭所见北宋末年的居养院和安济坊》,《考古》2009 年第 4 期。

救护和安辑灾民。^①

陈曦指出宋代荆湖北路的水神信仰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崇拜对象多元,水神庙主要分布在河道险要处与水患频发处,水神的职能以平息水患、守护航道为主,以祈求风调雨顺为辅。这些特点反映出在宋代这一本区历史时期开发的重要阶段,水患、泥石流、滑坡等灾害日渐影响人类活动,人们通过兴修堤防、疏通河道等治理活动来应对生态环境的变化;也反映出当时大规模的开发活动尚处于起步阶段,应对灾害的能力显得不足;同时,官方与民间共同推动了水神信仰的发展。^② 胡金明等认为隋唐—北宋时淮河流域人工湿地的变化与历代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关联影响。^③ 郭志安宋朝河役的长期开展,既对自然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也加重了民众的力役负担与人员伤亡。来自漕运、军事乃至政治体制等方面的限制,为黄河治理活动的开展设置了诸多羁绊;河政管理中官员渎职、欺压河卒及贪蠹资财等现象的普遍存在,也严重干扰了黄河治理活动的正常开展。^④ 王艳论述了北宋时期汴渠漕运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凸显作用以及对汴渠的维护和修浚。指出北宋时期清理淤积、加强防汛、导洛通汴和加强堤坊防护与维修的治河技术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虽未根除汴河隐患,但基本上保证了汴渠漕运的畅通。^⑤ 戴庞海、陈峰指出为了确保黄河沿岸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的稳定与安全,北宋政府高度重视黄河治理工作,曾屡次就此问题号召朝野人士进行讨论研究,群臣和皇帝本人都曾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治理建议和方案。^⑥

其他 郑颖慧宋代反传统的义利思想体系与其时代历史背景紧密相联,并对明清之际启蒙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⑦ 马丽梅从宋代士大夫家宴消费的角度,考察了宴饮的酒饌果品、歌舞娱乐、香、烛、花等消费项目,以及不同层次的消费水平。^⑧ 胡旭宁指出宋代在乡间、市镇或地形险要处设置的巡检,成为最基层、最贴近乡村社会的官员,是联系国家统治机构与乡村基层社会的媒介。^⑨ 吕变庭、周立志认为伊斯兰玻璃制品在宋代不仅是珍贵的宗教器物,而且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而逐渐走进了宋代市民的日常生活里,成为指点宋代经济和文化繁荣发展的一个客观标识。^⑩ 刁培俊认为保甲法本身的一些制度性问题,颇值得认真辨析——熙宁六年时,保甲的编制自十、五十、五百户改变为五、二十五、二百五十户,并成为此后保甲法和混同于乡役法后保甲编制的主要形式;熙宁八年闰四月之前,保甲法已经混同于乡役法了;就役法问题上的“元丰旧制”,是和王安石变法后乡役制度的重新编排有关的;已成为乡役制的保甲名目保正副,其设置和职责,在北宋后期和南宋时期,因时空之不同而有区别。^⑪ 张涛、宋三平认为宋代水陆交通进一步拓展,极大地改善了本区的内外交通条件,有力地促进了江西社会经济的发展,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⑫

① 《论北宋河患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与政府应对——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例》,《中国农史》2009年第1期。

② 《宋代荆湖北路的水神信仰与生态环境》,《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

③ 《隋唐与北宋淮河流域湿地系统格局变迁》,《地理学报》2009年第1期。

④ 《北宋黄河治理弊病管窥》,《中州学刊》2009年第1期。

⑤ 《北宋汴渠水利工程考》,《安徽农业科学》2009年第2期。

⑥ 《北宋政府治理黄河的主要措施》,《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3期。

⑦ 《宋代义利思想初探》,《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⑧ 《宋代士大夫的家宴消费浅探》,《消费导刊》2009年第21期。

⑨ 《浅谈宋代巡检缉私职能的考核》,《兰台世界》2009年第21期。

⑩ 《伊斯兰玻璃制品对宋朝经济生活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

⑪ 《宋朝“保甲法”四题》,《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

⑫ 《宋代江西地区交通建设与维护述论》,《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